

国际足球政治的潜规则与治理之道

——评安德鲁·詹宁斯的《FIFA 黑幕：国际足联的贿赂、选票操纵与球票丑闻》

王润斌¹，姜勇²

(1.南昌航空大学 体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63; 2.大连理工大学 体育教学部,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 要: 安德鲁·詹宁斯的《FIFA 黑幕：国际足联的贿赂、选票操纵与球票丑闻》全面、深刻揭示了国际足球政治危机背后的潜规则乱象。高度集中的权力、个人敛财欲望、利益群体非对称性较量、法律制裁不力等是潜规则的成因。严格控制营利性行为、合理化分配资源权益、加快民主法治进程、强化媒体舆论监督、尝试全球治理实践等是国际足球政治变革的必由之路。

关 键 词: 体育社会学; 足球政治; 潜规则; 国际足联; 安德鲁·詹宁斯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2)01-0060-06

Hidden rules in international football politics and ways to their governance

——A review of the book titled *Foul! The Secret of World of FIFA: Bribes, Voted Rigging and Ticket Scandals* written by Andrew Jennings

WANG Run-bin¹, JIANG Yong²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nchang Aeronautics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63, China;

2.Department Physical Educatio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The book titled *Foul! The Secret of World of FIFA: Bribes, Voted Rigging and Ticket Scandals* written by Andrew Jennings revealed signs of chaos of hidden rules behind international football political crises. Highly centralized power, individual greed for inappropriate wealth accumulation, asymmetrical gaming and inadequate legal sanctions are causes for the formation of hidden rules. Strictly controlling profit making behaviors, rationalizing resource distributing rights,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legal governance, intensifying media opinion monitoring, and trying the practicing of global governance, are inevitable ways to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football politics.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 football politics; hidden rule; FIFA; Andrew Jennings

“安德鲁·詹宁斯这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打击坏蛋”^[1]。詹宁斯的工作始于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他的 2 本书《五环贵族》以及《新五环贵族》对国际奥委会的腐败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我调查过贪污的警察、腐败的政府和职业罪犯，因为对英国与伊朗的秘密关系的调查揭露丑闻及骗子警察而获过奖。在 40 岁的时候，我开始把目光转向体育界。”^[2]2006 年，詹宁斯把对国际足球政治潜规则的调查成果汇聚

成书《Foul! The Secret of World of FIFA: Bribes, Voted Rigging and Ticket Scandals》，震惊世界体坛。著名足球评论家颜强^[3]指出：“他用了差不多 10 年时间，来调查国际足联的幕后丑闻……一幕一幕将各位国际足联大佬拖上舞台，然后一个又一个地剥下他们身上荣耀的幡羽，辛辣的嘲讽、无情的鞭笞。”这本解密国际足球政治潜规则的作品曾被布拉特诉诸瑞士法院，请求在全球范围内禁止出版发行。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该书随后被翻译成 15 国文字，广为流传。2010 年 3 月，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中文版《FIFA 黑幕：国际足联的贿赂、选票操纵与球票丑闻》（以下简称《FIFA 黑幕》）。

《纽约时报》评论：“一直以来，像国际足联、奥委会这样大型的非政府组织，其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决策透明度，常常与他们所推崇的公平、公正的体育精神相去甚远。这本书，很好地解释了这一奇怪的现象。”这种奇怪的现象，用中国学者吴思^[4]的历史逻辑来判断，即国际足球政治的潜规则在作祟。吴思透过历史表象，揭示出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并将其名之为“潜规则”。在詹宁斯的书中，国际足球政治领域显然也存在着这样的潜规则乱象。

1 国际足球政治潜规则

1.1 钱权交易

詹宁斯在《FIFA 黑幕》中揭露了 ISL 公司在获得了 2002 和 2006 年世界杯营销和转播代理合同时，没有将 100 万瑞士法郎的回扣打给某位高官，而是直接转到了国际足联的账上。ISL 公司是阿迪达斯的子公司。詹宁斯在《五环贵族》中提到，布拉特在 1972 年到国际足联赴任之前曾在阿迪达斯兰德海姆的总部接受了培训。“阿维尔热绝不会忘记，他身边的秘书长布拉特是一个由达斯勒挑选，效命于阿迪达斯的‘自己人’。而布拉特本人对此也铭记于心，作为一名体育官员，他的政治前途已经与阿迪达斯的三叶草商标紧紧地捆在了一起”^{[2]32-33}。

《FIFA 黑幕》提到，1995 年，美国的体育市场营销公司 IMG 就盯上了世界杯的营销权，然而 IMG 当时天价报价丝毫没有打动国际足联，反而处处受制于国际足联。在布拉特的一手操控下，IMG 在开标前 27 天才得到 2002 与 2006 年两届世界杯打包销售的消息，根本没有时间重新估算报价与寻找银行担保。IMG 欧洲区董事长德罗萨尔向布拉特表示抗议：“赛普，我断定，整个竞标过程中其实存在着双重游戏规则，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你对于我们努力的回应只是装装样子，只是为了使国际足联将来免受不公平与不正当竞争的指控。”^{[2]60} ISL 公司最终中标，也有了 100 万瑞士法郎回扣的出现，布拉特不得已悄悄地绕过财务委员会处理了这笔款项，巧妙地掩盖了权钱交易的行为。

1.2 选票之争

选举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和特征，而这种特征要能真正融入民众的政治生活并

正常运作，必须以一定的公共领域及在此之上所展开的公开而合法的政治营销为前提^{[6]64}。这种竞争性的政治营销正体现了民主的内在品质，然而当候选人采用所谓贿选以取得选票或改变选举结果时，民主与公平往往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在国际足联若干领导职位的选举与世界杯举办权的选举中，贿选与选票交易的丑闻屡被曝光。

2010 年 10 月 18 日，英国《泰晤士报》曝光了国际足联执委在世界杯申办拉票过程中的索贿丑闻，国际足联立即展开调查，并对 2 位涉嫌的执委停职。2010 年 11 月 29 日，BBC《全景》节目又披露里奥兹、特谢拉及哈亚图等高级执委曾经接受重金贿赂。在 2011 年 5 月 10 日的英国议会听证会上，前英国足总主席特里斯曼指出，至少有 4 名国际足联执委涉嫌向英格兰世申委索贿。特里斯曼表示，国际足联副主席杰克·沃纳最先向自己提出了“给钱”的要求，索要的数额达到了惊人的 250 万英镑。除了沃纳，巴拉圭籍的 FIFA 执委莱奥兹更是狮子大开口，此人向英足总索要的竟然是英格兰的皇家爵位。相比之下，巴西籍执委特谢拉则要“含蓄”得多，他对特里斯曼暗示说：“过来谈一下你能为我提供些什么。”泰国人马库迪要求英格兰国家队和泰国国家队进行一场友谊赛，转播权由他控制。英格兰为 BBC 曝光国际足联的潜规则付出了代价，2 票的得票率把国际足球政治的现实与残酷演绎到了极致。

《FIFA 黑幕》还揭露了杰克·沃纳在 1996 年的选举中找人冒名顶替海地委员基斯投票，1998 年为了支持布拉特打败约翰松，他又让朋友内维尔·弗格森再度顶替缺席的基斯委员。詹宁斯从时任非洲足联主席的法拉赫·阿多那里采访到了更令人震惊的内幕：“他们要塞给我 10 万美金，让我将票由约翰松改投布拉特……其中一半是钞票，一半则是折算成足球装备送给我国。”^{[2]84} 而拒绝带来的后果就是阿多在 1998 年国际足联会议的登记证遭到了篡改而最终无法投票。在 2006 年世界杯申办投票前，为了得到非洲 50 余票的支持而又不得罪阿迪达斯与基尔希财团及其背后的欧足联势力，布拉特选择了秘密地同时支持南非与德国，由于新西兰委员邓普西的弃权导致南非在第三轮投票中以 11：12 败北。据邓普西说，他受到了来自欧洲财团的巨大压力。而德国为了获得亚洲的选票，不惜改变出口武器的政策向沙特提供 1 200 枚反坦克导弹。显然，为了选票，各种各样的交易在国际足球圈内不断进行。

1.3 球票丑闻

《FIFA 黑幕》还揭露出个别国际足联官员利用手

中的权力大量订购门票并大肆抬价售卖的丑闻。2002年,时任国际足联秘书长的鲁菲南揭露了哈曼将自己通过特权购买的世界杯门票再倒手卖到黑市牟取暴力的事实。鲁菲南透露说,哈曼(原亚足联主席)以个人的名义购买数十张世界杯紧俏门票,例如英格兰队与瑞典队的比赛、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的比赛等等。细心的鲁菲南记下了球票的序列号码。哈曼因此受到了国际足联的警告。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来自博茨瓦纳的伊斯梅尔·本哈杰因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倒卖12张足球门票,被国际足联遣送回国,解除一切有关世界杯的职务。伊斯梅尔·本哈杰坦白说:“我曾将12张2006年FIFA世界杯第1轮英格兰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比赛第一档次门票以每张300欧元的价格出售,这一价格比票面价格高出200欧元。我对于这一错误行为感到深切的悔恨。”

国际足联所有执委都有权在小组赛每场比赛各购买10张门票,第2阶段则可以每场比赛购买5张门票,虽然这是国际足联规定,但是几乎每个执委购买的门票都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开赛之前,国际足联副主席杰克·沃纳的儿子达里安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拥有一家名为星普尔的旅行社,他利用父亲职务之便,得到大量门票,再通过这家旅行社大肆倒卖门票牟取暴利。但杰克·沃纳和达里安仅仅接受了国际足联调查小组的询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也最终不了了之。在詹宁斯看来,这样的结果不过表明了球票交易背后隐藏着国际足联与球票代理机构之间不成文的利润分成的潜规则罢了。

2 国际足球政治潜规则的成因

2.1 权力的高度集中

国际足联是典型的国际非政府体育组织,《国际足联章程》在形式上按照传统非营利组织的领导决策方式进行制定,即突出理事会制度与秘书长的职责。“执委会是国际足联的执行机构,秘书处是国际足联的行政机构”。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国际足联主席的权力过于集中,而且布拉特本人善于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在执委会或核心专业委员会等重要部门中,以便在决策中形成有利于自己的投票结果。青木昌彦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内部人控制问题”,是指独立于所有者(外部人)的经理人员掌握着组织的实际控制权,在组织运行中充分体现自身利益,甚至与下属“合谋”谋取各自的利益,从而架空所有者的控制与监督的情形^{[7]53}。

布拉特上任之初,就试图削弱秘书长权力、架空秘书长鲁菲南,“国际足联实际上有了两套行政班子:其中一套由名义上的秘书长鲁菲南主持,另一套职能

相同且有挑战意味的班子则由‘隐形’的秘书长热罗姆·尚帕涅领导……布拉特和他的精干队伍决定着国际足联的所有事情。有时鲁菲南会列席核心集团的会议,但他并不受欢迎,布拉特集团就想从他手里把权力一把夺走”^{[2]27}。2002年,因卷入哈亚图与布拉特争斗,鲁菲南被剥夺秘书长职务,布拉特亲信林西任秘书长兼财务总监。与此同时,格隆多纳被安排做财务委员会主席,沃纳做了副手,俄罗斯委员科洛斯托夫被安排做国家足协委员会主席。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只能导致在“市场开发权的委托代理”等重大事务决策中,国际足联内外利益团体利用规则漏洞并通过私人关系来实现小团体利益,最终损害了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国际足联的公共利益。

2.2 徇私敛财的欲望

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离职时,曾感慨:“当我继任主席席位时,国际足联账上只有可怜的20美金。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宣布,事情已经大为不同了。我将笑看4亿美金的支票而离开了。”^{[8]64}的确,国际足联通过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开发获得了巨大成功。1994年美国世界杯,国际足联获得9600万欧元收入,而2010年南非世界杯已经给国际足联带来了近32亿美元的收入。国际足联2007~2010年的财务报告显示,国际足联的总资产已经达到41.89亿美元。Eisenberg^[9]研究了国际足联的商业开发轨迹后指出:“国际足联希望保持住这种盈利水平和运动的长远发展,需要格外注意自身民主决策体系。”然而遗憾的是,诱人的世界杯收益因国际足联不够透明的决策与分配体系被某些商人和官员大肆攫取。

经济学家布坎南认为,每个经济人都具有理性,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有自利性。《FIFA黑幕》披露国际足联重要官员不仅从国际足联获得高额工资,还享受到了全方位的私人服务:“国际足联财政部门为领导层的每一位官员都保管着一个私密帐户,他们的差旅费、招待费、世界杯球票开销,乃至个人支出都可以从这个秘密账户走。他们不用费心保存收据、酒店和餐馆的账单、信用卡结帐、航空公司的发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报销”^{[2]99}。除了个人欲望获得满足外,国际足联高官们还为身边的其他人谋取利益。2009年,接替ISL获得FIFA商业开发合同的Infront公司的CEO名叫菲利普·布拉特,是布拉特的侄子。这家公司成立时间不长,却获得2010年世界杯电视转播代理和市场开发权,还持股一家英国的Byrom公司,负责南非世界杯商业球票发售。正如有学者批评的那样:“他们只是把足球当做营生乃至牟取利益的工具,对个别足协官员来说,更将足球比赛演化成政治化的

商业活动，甚至把足坛当做升官发财的捷径。”^{[10]4}

2.3 利益群体非对称性较量

2006 年，德国世界杯组委会最后公布的账目显示，德国世界杯盈利 2.06 亿美元，税后利润 1.45 亿。德国权威报纸《图片》报的调查数据显示，世界杯为整个德国带来了约 200 亿美金的收益。丰厚的回报让世界杯主办权竞争变成了多家利益群体博弈的舞台。

“2018 年和 2022 年世界杯足球赛主办权的争夺正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竞争……大概有来自 4 个大洲的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希望举办这一世界最大规模的单项体育赛事。到 2010 年 12 月国际足联执委会投票表决时谁会成为赢家，这一悬念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11]。在利益群体博弈中，作为决定权的国际足联明显带有绝对的主导权，这是一场信息不对称的较量。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12]31}。现实中交易各方信息不对称具有普遍性，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会引发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从而使互利互惠的交易难以进行，造成帕累托最优无从实现。机会主义行为的典型表现就是寻租行为的发生，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因而各种要素所有者和公共资源掌控者势必会实施一些垄断措施，以阻止要素的经济租金流失，租的产生由此引发出寻租活动。在世界杯的申办中，寻租设租的潜规则也存在着，英国媒体对卡塔尔世界杯贿选的揭露并导致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对哈曼等人的调查就说明了这一点。

2.4 法律体系存在漏洞

“从体育法角度来讲，国际足联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管理，最主要原因是国际足联的身份非常特殊，它是一个民间组织，这就可以让它躲过很多监管”。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专家张笑世说，“如果要国际足联进行监察，就一定要依靠所在地的司法部门。”^[13]当 BBC 在 2010 年底控诉国际足联与 ISL 公司的金钱交易时，国际足联迅速发出了回应，认为这些事关 ISL 的问题要追溯到很多年前，瑞士楚格州刑事法庭在有关 ISL 的案件中，没有判定任何国际足联官员有罪。楚格法庭的调查结束后，瑞士另一家小法庭重新调查 ISL 案件，他们确认国际足联官员曾经收受 ISL 公司的黑金，由于涉案人员中没有瑞士公民，随即放弃了深究。根据瑞士法律，国际足联是非营利国际组织，并不会受到瑞士腐败法的约束。国际足联缴纳了 350 万英镑的罚金，庭外解决了问题，并要求对方不要对外透露受贿国际足联官员的名字。另外，国际足联还强硬规定，足坛的内部问题，只能在内部解决，不得提

交给当地的司法机构。他们甚至利用足球的巨大影响力，去制裁那些试图挑战其权威的国家。1997 年，阿维兰热发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通牒：如果巴西政府要追究巴西足协的腐败问题，国际足联将开除巴西的会员资格^[14]。更为严峻的局面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目前还没有针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难以对跨国性贿选、投机活动的国际足联等国际行为体及成员进行有效的监管与制裁。

3 国际足球政治潜规则的治理

3.1 营利性行为的调节控制

非营利组织必须是非营利性的，这种公益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像企业一样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又因为它的民间性，决定了它也不能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支出，往往把营利性行为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只要不把营利收入用来分红，“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允许非营利组织开展营利活动与其宗旨或法律定位并不冲突，而且这也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15]44}。然而，由于非营利组织享受免税或减税的待遇，像国际足联这样的非营利组织往往利用制度的缺陷获取更加可观的利润。西蒙·库珀所说的世界杯不再经典，也正是意指国际足联正在变成一个惟利是图的跨国企业，而在这样的企业中，不会再有充满灵感和即兴发挥的表演，一切都将按部就班——最大化的利润是关键。

因此，必须借鉴其他非营利性国际组织经验，对国际足联的世界杯营销、无形资产开发等行为制定并严格执行适当的附加规制，如统一明确组织开展营利活动的空间和限制条件，国际足联及代理机构、下属机构必须开展与其目的的宗旨有关的营利活动；健全财务制度，对不同收入分类建账，将全部营利收入或相应比例用于公益事务，瑞士政府也能够对国际足联的营利收入进行适当的税收调节等；各国家也能够逐步建立相应的税收调节制度，从而建立国际足联从事营利活动的特殊规则，避免因为显规则的漏洞而发生钱权交易的潜规则。

3.2 资源权益合理分配

布拉特曾经说过，一些欧洲大牌足球俱乐部把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最好的球员给挖走了，这种作法就像新殖民主义者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非获得 2010 年世界杯主办权时，伦敦卡斯商学院的茨曼斯基教授受邀为南非组委会制定营销方案。在他看来，国际足联存在的种种垄断做法就是殖民主义，南非政府接受了国际足联获得世界杯 75% 营销权益和收益的条款，也就意味着国际足联已彻头彻尾地成为与东印度公司一样的寡头。开普敦大学的学者苏菲·纳库艾

拉认为,南非世界杯实质上是南非国家主权的沦丧:“在国际足联或者国际货币基金承担的所谓项目中,不发达国家的主权早已遭到粗暴的侵犯。为了不可预知的发展和利润,他们放弃了太多已经可以确定的权利和收益。”^[16]

虽然两位学者的结论过于极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足联通过世界杯主办合同、世界杯营销方案等权力垄断的行为,牢牢地占据着资源权益分配的“食物链”顶端,而那些处于底端的利益团体必须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通过潜规则的手段来获取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利益。要打破这种资源垄断与权益分配不公的局面,就必须增加主办城市在世界杯收益中的分配份额,增加发展中国家足协在国际足联物质、技术、人员援助中的比重,增加亚非国家在国际足联的席位以及执委会中的席位,尝试国际足联主席的竞选改用各大洲主席轮换制以限制欧洲国家的中心地位、削减其统治性势力范围的做法。

3.3 加快民主法治进程

英国学者阿克顿曾言:“权力产生于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显规则中的大量自由裁量权和程序规划中的可弹性操作为公共权力场潜规则的运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17] 詹宁斯曾说过布拉特不会退休,他必须保持这个地球上最具权势体育人物的地位,一直干到殡仪馆来人把他的尸体用黑色袋子装走为止。在 2011 年的竞选纲领中,哈曼大胆地提出了将国际足联主席的无限任期限更改为 8 年的建议,却因为一场来自布拉特的控诉而夭折。因此,对国际足联而言,首先要打破的是主席的终身制与特权制,增强主席等领导者的责任意识,建立委员和媒体的问责制度、推行引咎辞职制度、推行主席薪金与财务公开制度。

此外,必须完善民主集中制,进行民主决策、科学管理,打破执委会等核心权力机构中的利益小团体,还要进一步扩大非洲、亚洲等地区足协的话语权,逐步削弱欧洲中心主义的利益团体实力。更要全面完善法律法规,补充显规则的不足。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减少法律法规的模糊性,消除盲区,特别是国际足联主席、执委、委员选举以及世界杯主办城市的投票必须推行更加公开透明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自由裁量权。严厉制裁违反规则的国际足联官员,提高利用潜规则的成本,遏制潜规则的发生。

3.4 加强媒体舆论监督

国际足联对有正义感的媒体、敢于揭露潜规则的詹宁斯们采取了打压政策。布拉特曾经在记者发布会上斥骂:“当今社会充满着恶棍,这些恶棍也在足球圈里存在着。我们必须同那些控诉 FIFA 的人展开战斗,他

们必须受到惩罚。”^[18]詹宁斯被禁止参加国际足联及其下属各大洲足联的所有活动。国际足联曾经在 2003 年和 2005 年 2 次起诉詹宁斯以及《每日邮报》,最后的调查结果,除却一些细节出入外,法庭认为被告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起诉也就只能以败诉告终,而且 2 次起诉的法庭庭审费用,最终都得由国际足联承担。

白岩松曾经提出了“媒治”的概念,即当今社会问题通过媒体曝光、监督、批判得到治理的一种方式。有学者认为“媒治”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传媒及其报道能够一贯地正确,并永远地做到公平正义;二是传媒的监督可以被有效地落实或执行。通过 BBC 曝光、揭露国际足球政治的潜规则及其效果来看,起到了媒体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而且 BBC 也较好地坚持了正确的价值导向、树立了坚固的公信力体系,“总的看来,在曝光国际足联丑闻事件中,BBC 自始至终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其公信力体系得以构建并延续的表征”^[19]。在如今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的状况下,批判力、公正性依然是媒体最有价值的内在品质,只有更多的媒体始终秉承秉持这样的品质,国际足球政治的潜规则终究会被曝光。

3.5 全球治理实践的尝试

俞可平^[20]指出:“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足联对赌球等具有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过多边主义合作的先例。国际足联在 2011 年 5 月 10 日对外宣布,国际足联已经与国际刑警组织达成协议,双方将密切合作打击国际足球比赛中出现的假球,为此国际足联将为国际刑警组织提供 2 000 万欧元的专项资金。布拉特表示国际足联主动伸出手寻求帮助标志着一个历史性时刻:“同官方和警方合作来对抗那些想要摧毁比赛的人对我们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21]

全球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而出现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共同特点是其跨国性和“非领土性”,单靠一个国家难以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和解决。国际足球政治潜规则的发生也带有跨行业性、跨国家性、跨区域性的特点,单单依靠国际足联从内部解决已经很难根除弊病,必须采取全球治理的方式加以尝试解决。全球治理还强调行为主体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在全球层次上,治理一直被视为主要是政府间的关系,但现在它必须被理解为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运动、跨国公司以及全球资本市场,它们均与影响力急剧扩大的全球大众媒体相互作用。”^[22] 为防范国际足

球政治潜规则的发生，必须建立国际媒体机构、学术团体、国际奥林匹克组织、国际(区域)政府组织共同发挥作用的合作机制，尤其要结合非国家行为体灵活参与方式的优势以及国家行为体整合资源的优势，对政治潜规则进行多边式的治理。

2011年5月31日，布拉特面对记者的诘难依然强硬：“危机？你说什么危机？我们刚刚欣赏了一场精彩的欧冠决赛，足球没有危机。我们也没有陷入危机，只是遭遇了一些困难，这些都能在我们内部得到解决。”布拉特的反驳，在沃纳向记者展示的FIFA秘书长瓦尔克暗示哈曼通过贿选帮助卡塔尔获得世界杯举办权的邮件面前显得苍白，无论哈曼宣布退选还是被停职，国际足球政治的混乱依然没有结束。对国际体育的权力格局进行长期、深入研究的约翰·苏登与阿兰·汤林森指出：“国际体育治理的变革并不是必然进行，但存在可能。体育治理是一种两极之间的平衡，这取决于全球变革与守旧治理之间的博弈。改革很有可能来自于不同因素的结合——内部变革的需要、外部的压力以及通过危机和瓦解带来的改变。”^{[23][2]}

《FIFA黑幕》只是一本揭示国际足球政治黑幕的畅销书，批判性有余而建设性、学理性、前瞻性不足，然而一旦潜规则大白于天下，在外界压力和内部需求的双重作用下，未来的国际足球政治行为必然要走向补救、纠正、改革的道路，张吉龙担任亚足联执行主席一职未能肃清哈曼留下的负面影响，但毕竟代表着在国际体育权力格局中争取话语权的中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影响，可以通过参与制定游戏规则来改变混乱不堪的局面，这对国际足联的改革、对国际足球政治重新走向新的治理内稳态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

参考文献：

- [1] 王大骥. 安德鲁·詹宁斯 揭开国际足联黑幕[J]. 南方人物周刊, 2010(16): 80-81.
- [2] 安德鲁·詹宁斯. FIFA黑幕：国际足联的贿赂、选票操纵与球票丑闻[M]. 徐天辰，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 [3] 颜强. FOUL! 詹宁斯“淘粪精神”[N]. 金融时报：中文版，2008-05-21.
- [4] 吴思.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M]. 修订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 [5] Vyv Simson, Andrew Jennings. The lord of the rings: power, money and drugs in the modern Olympics[M]. London: Simon & Schuster, 1992.
- [6] 束锦. 当代中国选举中的竞争性研究——兼论“贿选”与“竞选”的制度性应对[J]. 探索, 2007(2): 64.
- [7] 李炳秀, 陈晓春. 内部人控制与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探讨[J]. 云梦学刊, 2005, 26(2): 53.
- [8] John Sugden, Alan Tomlinson. FIFA and the contest for world football: who rules the people's gam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 [9] Christiane Eisenberg. The development of a transnational soccer community in a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C]. German South African Lecture Series on Soccer, 2010: 112.
- [10] 何丹翩. 足坛腐败原因探究[J]. 检察风云, 2010(13): 14.
- [11] 2022、2018 两届世界杯申办竞争激烈[N]. 参考消息, 2009-02-04.
- [12] 侯光明. 管理博弈论导论[M].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21.
- [13] 国际体育组织已成黑金重灾区，非盈利性质迷惑大[N]. 中国青年报，2010-12-02.
- [14] 国际足联堪称法律绝缘体，FIFA 果真是“非法”组织[N]. 钱江晚报，2011-05-12.
- [15] 刘建银. 非营利组织营利活动及其收入的税法規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1(1): 44.
- [16] Daniel Howden. FIFA makes killing at South Africa's expense [N]. Independent, 2010-06-10.
- [17] 赵宏伟, 郝永勤. 公共权力场潜规则的特征、成因及对策研究[J].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0, 24(4): 72.
- [18] BBC Panorama. Scripts of FIFA's Dirty Secrets [EB/OL]. www.bbc.co.uk, 2010-11-29.
- [19] 吴柳林. 公共利益至上——从曝光国际足联丑闻事件看 BBC 的公信力体系[J]. 新闻记者, 2011(2): 18.
- [20] 俞可平. 全球化:全球治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3.
- [21] FIFA's historic contribution to INTERPOL in fight against match-fixing[EB/OL]. www.fifa.com, 2011-05-09.
- [22]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9.
- [23] Lincoln Allison. The global politics of sport——The role of global institutions in sports[M]. London: Routledge, 2005: 42.